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過程研究

段家鋒

本文作者現任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所長，本文係其向第二屆中韓學者雙邊會議所提論文

——編者

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起點與發展

中共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發表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第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肯定「分歧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中共強調，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蘇共走上修正主義的第一步，認為對史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中共說史大林的一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史大林「犯過某些嚴重的錯誤，但和他偉大的功勳相比較，畢竟是第二位的。」因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醜化了無產階級專政，醜化了社會主義制度，醜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也醜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①。

中共認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引起的嚴重後果，是直接促成國際共產運動的分裂。中共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使修正主義思潮大為泛濫起來。在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內，大批叛徒跟着帝國主義、反動派和狄托集團一起，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攻」^②。

中共並列舉具體事實，說狄托集團叫嚷，「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給南斯拉夫的『新趨勢』創造了相當多的因素」。這次大會「直接引起蘇波關係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中共指責，蘇共對波蘭企圖用武力鎮壓，「犯了大國沙文主義」，對匈牙利革命勢力一度妥協，「準備採取投降主義」。蘇共這些錯誤，「給國際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③。

卡特總統首席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在他的「蘇維埃集團的合與分」(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一書裏

註①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參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

五)，頁五九至六五。

註② 同註①，頁七四。

註③ 同註①，頁七三至七五。

，看法與中共頗為一致。布氏以爲，赫魯曉夫精心設計摧毀了史大林「永不犯錯的神話」，帶給他決定新路的充分自由，也帶給蘇共集團以沉重負擔。因爲抨擊史大林的，也適合抨擊整個蘇共集團的每一領導人。赫氏暗示社會主義可以經由非暴力的社會民主程序實現，各國可以有自己實現社會主義的不同路線，及以社會主義爲基礎的人民民主^④。貶棄史大林主義的結果十分嚴重，布里辛斯基結論說：「貶史包括貶棄史大林個人和史大林主義教條，這些都是長期支撐蘇共集團意識形態的主要力量。毀棄這些力量，赫魯曉夫帶給蘇共集團在意識和法理上，同樣沉重的負擔。南斯拉夫的地位自然而然成爲匈牙利和波蘭要求看齊的『家務事件』，它的重要意義是對共產國家關係構成一項嚴重考驗」^⑤。

布里辛斯基在他書內把一九五三年史大林死亡到一九五六年被清算鞭屍，稱爲第三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是共產集團內部從解凍到洪流氾濫，使國際共產運動的組織和意識形態，都發生空前的分歧現象。結果掀起匈牙利革命、波蘭暴動，以及其他共產國家的不安^⑥。

赫魯曉夫清算史大林是國際共產運動分裂的起點，大致爲學者所公認。李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在他所著「馬克思主義的三付面孔」(*Three Faces of Marxism*)一書的序言裏開宗明義就指出：「史大林死後，蘇共一九五六年二月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國際共產運動分歧的起點。有這分歧才引發那一年的波蘭抗暴和匈牙利十月革命」。他更認爲，羅馬尼亞一九六二年的要求獨立，捷克一九六八年由春至夏的要求改革，都種因於這次大會^⑦。

赫魯曉夫秘密演說長達七小時。他要求放棄個人崇拜，在只數說史大林個人罪惡的原則下，展現他統治東歐「大家庭」、推行共產運動的新方法。但他對史大林的批判却是有限度的，即從一九三四年史大林掌握全權後，凡是涉及包括赫魯曉夫等在內的共同罪惡，例如史大林統治下的制度等，則避而不談。所以很清楚的事實是，蘇俄領袖們很小的只從上面控制對史大林的批判，使這一運動不致揭露「社會主義民主」的假象。儘管有這麼多的保留，第二十次大會仍不失爲最重要的里程碑。因爲共產領袖的偶像，第一次給廣大羣衆以公開背棄的正當理由和機會^⑧。

南斯拉夫於一九四八年四月，被逐出國際共產情報局，和蘇共分裂。中共於一九四九年獲得大陸政權後，發現蘇聯的援助並

註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ighth Printing, 1979) pp. 182-183.

註⑤ *Ibid.*, p. 184.

註⑥ *Ibid.*, pp. 155-183.

註⑦ Wolfgang Leonhard, *Three Faces of Marxism: The Political Concepts of Soviet Ideology, Moism, And Humanist Marxism*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G. P. Putnam's Sons, 1974) Preface Xi.

註⑧ *Ibid.*, pp. 153-154.

不積極，也有不滿現象。但這一切都只可算是共產陣營的「家務事」，不能視為國際性的公開分裂。對第二十次大會引起的分裂，蘇共也自感問題嚴重，所以費盡心機用全部力量，召開三次世界共黨會議，企圖有所彌補。這三次會議是一九五七年的十一月的莫斯科會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和一九六九年六月七十五國的莫斯科會議。三次會議可以說是用力甚勤，收效甚小。

李昂哈德以為，馬克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現在分裂為三大勢力。其一是蘇共，以「科學的共產主義」自居。其二是中共，仍以毛澤東思想為主流。其三是人道社會主義或人道馬克思主義^⑨，源流可上溯至第二國際（The Second International），或第一次大戰前後之奧馬學派（Austro-Marxism）。但直接起因，則為反史大林主義，超然於蘇共、中共之外，追求馬克思之「人道思想」。七十年代中期表現的新形態，是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⑩。

二、中、蘇共的分裂與現狀

從赫魯曉夫回憶錄（*Khrushchev Remembers*）看，俄毛間很早就存在著不滿，俄共第二十次大會只是一個爆破點。赫魯曉夫說史大林經常尖刻的批評毛澤東，稱他為「密洞（脫黨）馬克思派（Cave Marxism）」，意為既孤陋寡聞，又離經叛道。赫魯曉夫說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攫取大陸後，不論在貿易、工業合作或意識形態上，都立刻和史大林有了緊張的分歧關係^⑪。

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作史大林死後的首次訪問北平，毛澤東一再慫恿赫氏和美國作戰，說中國可以派千百師部隊給蘇俄作戰。赫氏指責毛澤東戰爭觀念落伍，說現代戰爭，人多只是多製造一點原子彈和飛彈的灰塵而已。回俄國後，赫魯曉夫告訴他的幹部們說：「和中共衝突無法避免」^⑫。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親自率團赴俄參加第一次世界「共產黨勞工黨莫斯科會議」（Moscow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簡稱第一次世共會議），再勸赫氏發動戰爭，用大撤退爭取最後勝利。赫氏除嘆中共觀念的不進步外，分析中蘇共分歧的根本原因說：「和中共的基本分歧，愈為深廣。中共知道俄共第二十次大會離棄個人崇拜對它包涵的意義。反人民、反黨的獨裁統治，毛澤東緊跟着史大林的脚步走」^⑬。

註⑨ *Ibid.*, Preface Xii.

註⑩ *Ibid.*, Pp. 258-261.

註⑪ 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II, by Strobe Talbot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 1970) Pp. 462-463.

註⑫ *Ibid.*, Pp. 466-470.

註⑬ *Ibid.*, P. 471.

但一九五七年第一次世共會議以前，赫毛衝突並未表面化。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毛澤東仍強調：「中國蘇聯靠在一起，這個方針是正確的」^⑭。不過對內部，毛澤東已經表示他對蘇共的不滿。對於當年十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說「發生得好，有膿包總要出膿。」他說蘇共內部有許多問題，勸幹部不要學習蘇共的落後經驗^⑮。對於俄毛關係，一九五七年一月他主張繼續「扯皮」，他說：「中蘇關係，皮總是要扯的。不要設想世界上沒有扯皮，馬克思主義就是扯皮主義。……史大林實際上是形而上學，不承認對立統一，我們就和史大林有不同意見。我們要簽訂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裏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⑯。

第一次世共會議，是慶祝蘇俄革命四十週年的一次大會，實際上是對俄毛三年來意見分歧的一次內部調和會議。會議開幕的前一天——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演說：「社會主義陣營需要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全世界共產黨和勞工黨也需要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共。」波蘭共黨書記戈慕卡會對毛澤東堅決擁護蘇俄的態度，深表不滿^⑰。

實際上毛澤東用的是爭取共產世界領導權，以退為進的方法。會議以前的十月四日和十一月三日，蘇俄兩顆人造衛星領先美國升空，赫魯曉夫號稱推進衛星的洲際火箭是「最後武器」。但赫氏色厲內荏，知道歐美北約組織，勢不可侮。所以他的世界性戰略仍是高唱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 policy^⑱。毛澤東則一方面向中國留俄學生說「東風壓倒西風」（十一月十七日），一方面於十一月六日向最高蘇維埃演說，希望以共產兄弟國間的「互利、互尊、互信、互助、互勵」，爭取蘇俄集團內部的平等權和領導權^⑲。這項爭取弱小的戰略，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訪問印、緬時所提「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翻版。

第一次世共會議，毛共勢孤力單，只有阿爾巴尼亞站在毛共一邊，毛澤東不得不在一面倒向對方的宣言上簽字。宣言重點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肯定兩點：第一點是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第二點是爭取議會中穩定的多數。毛共附加但書，對前者說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對後者說要展開議會外廣泛的羣衆鬭爭，準備奪取政權^⑳。這次大會不論勝利屬誰，唯一

註⑭ 毛澤東：「在全國工商聯二屆一次委員會部份代表座談會上講話」（一九五六，十二，八），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頁六三。

註⑮ 同註⑭，頁六六、六七。

註⑯ 毛澤東：「省、市委書記會議總結」（一九七五年一月），同註⑭，頁八三至八五。

註⑰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45-147.

註⑱ *Ibid.*, pp. 154, 168.

註⑲ *Ibid.*, p. 147.

註⑳ 前揭《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頁七八。

結果是加重了國際共產運動的分裂，特別是中俄共間的分裂。

中共與蘇共的關係，自一九五九年起由兄弟黨的內部爭吵變成世界性的公開分裂。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撕毀一九五七年十月和中共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資料；一九六〇年七月至八月又撤回一、三九〇名蘇俄專家，撕毀三四三個專家合同和補充書，廢除二五七個科技合作項目^⑳。接着一九六〇年六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會議在布加勒斯特舉行，各共產國家參加。赫魯曉夫在會上公開指責中共是瘋子、左傾冒險主義、假革命等。會上支持中共的只有阿爾巴尼亞。至此，中蘇共決裂宣揚全世界^㉑。

蘇共於是把經過近三年準備的第二次世共會議，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參加者八十一國。這在國際共產運動史上，被認為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會議重點之一是試圖消除中蘇共間的歧見，彌補兩者間的巨大裂痕。但結果明白顯示，經過兩個月的談判，七十九個國家的斡旋，中蘇共間的分裂，沒有任何彌補的可能。會中涉及的議題，有共產集團領導問題，時代現勢問題，局部及世界戰爭問題，對落後地區戰略問題等。雙方各說各話，針鋒相對。形勢上仍是蘇共獲勝，因為贊成中共主張的，只有北韓、緬、馬、泰、印尼、澳洲等國共黨。實際上中俄共分裂的擴大加深，也是國際共產運動分裂的擴大加深。蘇共在國際共產運動中的優越領導地位，從此一去不返^㉒。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二十二次大會，周恩來率團參加，赫魯曉夫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理論，並攻擊阿爾巴尼亞。周氏為阿爾巴尼亞辯護，指責赫氏錯誤，並突然提前率團返平。毛澤東親自赴機場迎接。這以後中蘇共雙方不再試探全面和解，有所接觸，也只談些不能解決的枝節問題。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下臺，一九六九年六月蘇共召開第三次世共會議，雖有七十五個國家共黨參加，中共却拒絕出席。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死亡，同年九月毛澤東死亡，這些人事改變對於中蘇共的關係改善，並無任何幫助。

傑克森(C. G. Jacobsen)教授分析，毛澤東思想從他革命時期可能接觸到的書籍，以及他經常談話的深度看，他吸收太平天國和歷史農民暴動的思想，遠多於馬列學說。單純的農民暴動思想，易陷於天真的幻想和報復。大躍進三面紅旗屬於前者，文化大革命砲轟司令部和打倒「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屬於後者^㉓。

他認為中蘇衝突的根本原因在文化、領域、地理環境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毛澤東掌握政權後，走的路是史大林的國家資本主

註⑳ 同註⑳，頁八二、三四三。

註㉑ 同註㉑，頁八六。

註㉒ Zaboria, *op. cit.*, pp. 342, 367-368.

註㉓ C. G. Jacobsen, *Sino-Soviet Relations Since Mao* (New York: Praeger, 1981) pp. 69-70

義 (State Capitalism) 和一國社會主義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但史大林認識西方的實用哲學遠比幻想有用，所以竭盡一切力量和西方打交道，尋求西方經濟利益的協助。毛澤東却把自己孤立於一切西方國家的幫助之外，美其名曰「自立自強」²⁵。

現在華國鋒已靠邊站，鄧小平的親信胡耀邦、趙紫陽分據黨、政首腦地位。他們肯定毛澤東「功大於過」，走的仍是毛澤東的中蘇分裂路線。在雙方不斷互贈「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帽子的現在，和好希望殊少。中共「外交部」今（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發表備忘錄，說「蘇越勾結謀求霸權，是印支和東南亞局勢動盪的根源」。備忘錄要求越南人「應該放棄地區霸權主義政策，不再充當蘇聯的工具，從東老全部撤軍，停止威脅泰國，尊重鄰國領土主權完整」²⁶。布里茲涅夫則在蘇共第二十六屆大會上（一九八一年二月），教訓中共要知道美、日、北大西洋公約各國帝國主義者，「不會成爲社會主義的朋友」。他說這些國家是「爲了自己帝國主義利益而利用中國對蘇聯、對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敵意，一個冒險的遊戲！」布氏說現在中共自己承認，文化大革命是「最殘酷的封建法西斯專政」，證明中共過去的社會經濟發展，是個沉痛教訓，是曲解社會主義原則導致的惡果²⁷。顯然的，雙方在意識形態和國際關係認定上，差異越來越遠，彌補分裂，愈爲困難。

三、東歐自由化與歐共主義

歐共主義 (Eurocommunism)，指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主張獨立自主，以多元化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趨勢。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侵捷，刺激歐共主義的直接興起。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會議，給歐共主義畫出初步輪廓。一九七六年二十九國共黨東柏林會議，把國家獨立、內政自由的範疇，傳染 (infection) 給東歐各國²⁸。歐共主義是戰後東歐民族主義和蘇俄統合運動對抗的產物，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它不只尋求國家獨立的模式，而且尋求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多元化發展²⁹。

「歐共主義」這一專有名詞形成於一九七五年左右，源起可上溯自第二國際時代的愛爾弗特綱領 (Erfurt Programme) 精

註²⁵ *Ibid.*, pp. 58-59.

註²⁶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四日，第一版，中共外交部發表備忘錄。

註²⁷ 「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對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總結報告」（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三日），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譯，第一部。

註²⁸ Jiri Valenta, "Euro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Promise or Threat?" See *Communism in East Europe*, edited by Teresa Rakowska-Harnstone and Andrew Gyorgy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03-304.

註²⁹ Teresa Rakowska-Harnstone, "Nat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bid.*, pp. 308-309.

神，第三國際一九三五年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的統戰精神，以及戰後四十、五十年代的布爾喬亞精神；領導發揚歐共主義的是法、意、西、英、比、瑞典諸國共黨。歐共主義和傳統共產主義最大不同處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推行民主政治，通過議會多數，實行共產主義^{②⑧}。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割斷了蘇俄對東歐的強力統治關係。雖然蘇俄事後自我解嘲說，史大林的罪惡只是「健康身體內的一個腫瘤」(a tumor in a healthy body)，但腫瘤成癌，直接引起當年的波蘭抗暴和匈牙利革命。蘇俄軟硬兼施，竭盡全力，才使東歐這塊緩衝區秩序恢復，却引起西歐對共產運動的普遍失望。意大利一國便失去共產黨員二十五萬人，其他西歐國家失去共產黨員五萬人^{②⑨}。

當時反應最激烈的是中共和意共。毛澤東認為個人崇拜問題，各民族各有傳統，不必別人越俎代庖。意共總書記陶格里亞第(Togliatti)認為，史大林主義應從蘇俄制度的傳統裏去尋求答案，不必牽涉別人。於是俄共召開一九五七年第一次世界會議，一九六〇年第二次世界會議，以及一九六一年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邀請各國共黨參加，希望把以中俄共為主的世界性分歧，予以化解統一。但各國共黨要求全部獨立自主，蘇共發現與各國共黨間，從政治、意識形態到軍事問題，無所不分歧。這是促成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之一^{③①}。

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掀起捷克爭取獨立自由與政治民主的狂潮，給東歐各國帶來希望。法國共產黨在西歐熱烈聲援，稱為「五月爆炸」(May explosion)。布里茲涅夫無法忍受，「所以於八月二十日夜，命蘇、匈、波、保、東德五國聯軍，侵入捷克。這一侵略使西歐各國共黨，首次異口同聲對蘇共提出譴責。但西歐各國共黨仍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認為莫斯科的行動，是出於保衛社會主義所必需，因而對蘇聯已經籌備三年，而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三次世界大會，仍舊參加^{③②}。

蘇聯夥同五國聯軍進佔捷克之後，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宣布他的「有限主權論」之原則，是為布里茲涅夫主義。——和平肅清反革命(Silent Counterrevolution)：以非軍事的，緩和的，非公開的手段，和平的態度，肅清反革命。——有限主權論(Limited Sovereignty)：在某一國家內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只關係該一國家，而是為了保衛全世界。

註② Ernest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The Bitter Fruits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London: NLB, 1978), p. 42.

註③ Fernando Claudin, *Eurocommun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NLB, 1978) pp. 37-38.

註④ *Ibid.*, pp. 38-40.

註⑤ *Ibid.*, pp. 42-44.

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全。保衛世界社會主義制度安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天職。

——國際無產階級專政 (International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不止佔領捷克是對的，而且將來也有權干預任何社會主義國家^⑤。

布里茲涅夫主義承認各國得依國情以不同道路實現共產主義，但只是有限主權。他以為國家主權不是抽象空洞的觀念，從馬列主義立場看，它是應以具體的階級為內容的。目前世界分為兩大集團，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主權獨立，只能解釋為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獨立於資本主義國家之外，其政治和意識形態，應全受蘇聯領導，主權是受限制的。這說法引起南斯拉夫狄托、羅馬尼亞共黨首領西奧塞斯古 (Nikolai Ceausescu)，和中共的強烈反對^⑥。

七十五國參加的一九六九年六月第三次世共大會，緊接在中共同年四月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林聯手鬧倒劉少奇之後。世共大會召開期間，中蘇珍寶島戰鬥正在進行，蘇聯着手籌備此次大會，始於一九六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使毛共陷於孤立的緊要關頭^⑦。

蘇共召開此次會議，基本目的有四。第一，孤立中共。布里茲涅夫在會中說，中共九大以後，決定對「現代修正主義」(Present-day revisionism) 戰鬥。凡是觀點不同於中共的，都被斥責為「現代修正主義」。布氏認為，根本沒有現代修正主義存在，有的話只是中共驅使中國青年們「走向饑餓和備戰」^⑧。第二，確立「有限主權論」的理論權威。大會主要議題是「現階段反帝鬥爭任務及共產黨、工人黨、一切反帝勢力的統一」，亦即「現階段行動綱領草案」，計三萬字一四三條，其中第七一條說：「社會主義敵人並未放棄動搖社會主義國家機構的基礎、妨害社會改革的企圖。堅決反抗這種企圖，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負的絕對責任。保衛社會主義，在共產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國際主義義務。」第七十二條說：「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和加強，是社會主義世界體系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前提。」這是給有權出兵附庸國找理論根據^⑨。至於大會第三個目的，是攻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侵略，呼籲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大家庭的團結。第四，確定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茲不贅述。

就蘇共目的言，這是一次失敗的會議。蘇共既無法完全驅除中共於國際共產舞臺之外，也無力順利領導整個共產世界。當時全世界十四個握有政權的共產黨中，中共、阿共、北越、北韓、南共拒絕參加。東歐國家大致追隨蘇共譴責中共，例如捷共新書

註^⑤ Leonhard, *op. cit.*, pp. 198-199.

註^⑥ *Ibid.*, pp. 199-202.

註^⑦ Alfred D. Low,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 Analysis of the Polemic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82-284.

註^⑧ *Ibid.*, p. 283.

註^⑨ *Ibid.*, pp. 284-286.

記胡塞克 (Husak)、波蘭戈慕卡 (Gomulka)、匈牙利卡達 (Kadar)、東德烏布利希 (Ulbricht)，以及外蒙「人民革命黨」書記柴登堡 (Tsedenbal)、甚而法共羅徹特 (Waldeck Rocket)、都在會中指責中共侵略蘇聯邊境，是大國沙文主義。羅馬尼亞西奧塞斯古則站在中間稍偏中共立場，認為這次會根本不應該開。意共強論多中心論和各黨獨立路線，英、奧、西、瑞士、澳、挪等國共黨，則嚴厲責難蘇俄侵捷事件，並對有限主權論提出抨擊。

東歐共產附庸國是蘇聯面對西方的緩衝區，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早已不屬於蘇聯陣營，其餘最重要而帶給蘇聯苦惱最多的，是捷克和波蘭。捷克是高度工業化國家，波蘭則為蘇聯、中共以外世界第三大共黨國家。

蘇聯發動一九六八年侵略捷克之後，為安撫人心，仍准許抗蘇英雄杜布西克 (Alexander Dubcek) 擔任捷共第一書記，但隨時尋找機會，存心撤換。一九六九年春，捷克與蘇聯舉辦兩國曲棍球比賽，捷克舉國民情激盪，示威抗俄，志在必贏。蘇聯以再度入侵相威脅，四月，杜布西克被迫辭職，由胡塞克 (Gustav Husak) 繼任。胡氏立即訪問莫斯科，並與布里茲涅夫、東德烏布里希及匈牙利卡達會商，支持蘇共召開第三次世共大會^⑤。

蘇聯一九六八年侵入捷克，一九六九年迫使捷共更換第一書記，引起意共、法共、中共、南共等長期抨擊，蘇共及捷共對抨擊並不介意。一九七〇年，胡塞克整肅捷共幹部六七、一四七人，並使二五九、六七〇人在工作聘約屆滿後，失去續約機會。原因是新領導人不希望「布拉格之春」再度出現^⑥。一九七五年赫爾新基會議，商定有關和平與安全問題，重新掀起捷克人自由之火。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捷克知識份子、藝術家、經濟學者、退休政治家，共同發表宣言，呼籲全世界影響捷共尊重人權，被稱為「七七大憲章」(Charter 77)。此「大憲章」雖被捷共斥為「陰謀破壞社會主義的外國敵人」，同樣成為西歐關切談論的中心。很顯然的，布里茲涅夫主義仍將是引發捷克八十年代爭取獨立自主的契機^⑦。

比捷克更具爆炸性的東歐國家是波蘭。在波蘭渡過艱苦童年的波裔美國前總統首席顧問布里辛斯基說：「蘇聯在東歐領導地位的統一和組織重建，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保證恢復秩序。在恢復秩序中，波蘭走向社會主義的痛苦之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因素。」他強調波蘭問題在共產國家間所居的地位，「絕對舉足輕重」^⑧。

曾被四次瓜分的波蘭，在近代史上一直扮演悲劇角色。一九五六年波茲南抗暴和華沙學生示威，導致戈慕卡上臺。由於走的是集體農場和親蘇經濟路線，他在掌權十四年中，使波蘭經濟一再惡化。一九七〇年宣布六十八種民生必需品和重要物資鉅幅漲

註⑤ Zdenek Sula, *Zealots and Rebels: A History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80) pp. 353-356.

註⑥ *Ibid.*, pp. 357-359.

註⑦ *Ibid.*, pp. 370-374.

註⑧ Brzezinski, *op. cit.*, p. 338.

價，他終於在當年十二月，被迫下臺。

新任第一書記吉瑞克 (Edward Gierek)，初上任時，似乎要使波蘭經濟開新紀元。他曾在比利時和法國受教育，在西歐深獲好評。他能從西歐獲得信用貸款和技術援助，波蘭農產品強迫繳給政府的嚴酷規定，也大幅減輕，引起農民努力增產興趣，經濟一片繁榮。但好景不常，技術末節的改善，無補於制度造成的惡果。六十年代的經經衰退現象，再度出現。一九七六年吉瑞克不得不走戈慕卡當年的老路，宣布物價鉅幅上漲。於是工人罷工，社會混亂。波蘭在罷工、談判、復工、再罷工的循環中掙扎。一九八〇年七月，吉瑞克宣布肉類及日用品上漲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引發八月卅一日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創設「團結工會」，領導罷工。吉瑞克終於在九月六日下臺^⑬。

七十年代在波蘭是吉瑞克時代。「共產主義在東歐」作者之一高貝斯基 (Andrzej Korbowski) 認為，吉瑞克和戈慕卡在內政上同樣犯兩個錯誤，其一是官僚政治下政府孤立於羣衆之外，幹部不與羣衆接觸。其二是波蘭國會、議會，不能發生任何立法或制衡作用^⑭。他因而慨嘆：「不客氣說，戰後波蘭沒有產生過一位偉大的政治領袖」^⑮。這批評是事實，但顯然忽視了共產制度的先天限制。

卡尼亞 (Stanislaw Kania) 繼吉瑞克為第一書記，當時波蘭的罷工潮已經持續兩個月。至一九八一年九月初，卡尼亞主政一年，工潮尚無平息可能。因為一九八一年八月底波蘭政府宣布，麵包與穀類價格將上漲三倍，波蘭獨立團結工會 (Independent Solidarity Union) 主席華萊沙 (Lech Walesa)，在記者訪問時公開宣稱：「波共政權已經失去為社會接納和支持的基礎，團結工會必須負起拯救波蘭的責任」^⑯。美國國務卿海格於八月底說：「蘇聯領導階層已認清，干預波蘭不符合蘇俄利益」^⑰。可能是尚未到「有限主權」的極限。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起蘇俄在歐洲邊界舉行的海軍大演習，一般認為就是對波蘭施加的精神壓力。

四、第三世界的尷尬

周恩來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攫取大陸，至一九七六年元月死亡，擔任中共總理二十六年，其中前八年尚兼任外交部長。周氏在

註⑬ Andrzej Korbowski, "Poland." See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op. cit., pp. 43-45.

註⑭ Ibid., pp. 53-54.

註⑮ Ibid., p. 60.

註⑯ *China Post*, Sep. 2, 1981.

註⑰ *China Post*, Aug. 30, 1981.

二十六年間曾經八訪莫斯科，六訪緬甸，三訪阿爾巴尼亞。東歐附庸國包括捷、波、匈、東德，非洲中、東部十二國，及亞洲自阿富汗以東之印、巴、中南半島及東南亞國家，都有他的足跡。這是所謂「遠交近攻」的策略。特別有趣的是，在史大林一九五三年三月死亡前，周恩來除去一九五〇、五二年兩次朝俄外，未曾赴任何國家訪問。周某積極訪問蘇聯以外的國家，自一九五四年七月之內瓦會議始。換言之，中共是在史大林死後才開始展開對外活動，旨在和蘇共爭奪國際共產領導權。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大林死亡，七月韓戰停止，越戰繼起，中共是越戰幕後支持者。所以周恩來參加了一九五四年四月日內瓦越南停戰會議，正式與自由世界接觸。會後赴印度、緬甸訪問，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統戰五原則。一九五五年四月，再率團出席萬隆亞非會議，提出以反帝反殖為中心的中立主義，內容仍為「和平共處原則」，引起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al Nehru）、印尼總統蘇卡諾（Nasution Sukarno）、和埃及總統納塞（Gamal Abd-al-Nasser）三個中立主義者的熱心奔走。這和以後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狄托倡導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合而為一，都以第三世界為爭取的對象。但在一九七〇年前，中共和南共是彼此對立，互相攻擊的，兩者又同為蘇共所憎恨。

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論，是從西方工業高度發展的工人開始，毛澤東幾乎完全相反，認為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亞、非、拉廣大區域，才是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暴風圈，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外的第三世界。掌握了第三世界，就是掌握了「以鄉村包圍城市」的勝利契機。這一點中蘇共絕不相同。蘇共以為，世界革命可以武力鬭爭，也可以和平共渡。毛共以為，世界革命只有「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武力奪取政權，是唯一的一條路^④。

周恩來指揮的「中立主義」，前後活躍僅僅十年。一九六五年一月，非洲蒲隆地破獲中共陰謀顛覆組織，中共在非洲的經營全部破產。當年六月周恩來想去中、東非各國訪問，但除坦桑尼亞之外，各國均拒入境。同年九月印尼共黨政變失敗，中共幕後活動，全被拆穿。至此第三世界各國，無人再敢相信中共宣傳，中共亦只限於鼓吹中立主義或「團結全世界中小國家政策」，却在這些國家裏難以真正開花結果。

從時序上看，對第三世界的統戰，是中共播種，狄托收成。因為周恩來在國際上販賣「五原則」中立主義最活躍的時期是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自後便被迫鎩羽而歸，難出國門。繼之而起的，是狄托分訪各國首都之後，於一九五八年出面邀尼赫魯、蘇卡諾、納塞和阿富汗首相艾地馬底（Nur Ahmad Etemadi），會商於南斯拉夫布里奧尼島，發起不結盟運動。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在貝爾格萊德召開第一次不結盟會議，出席者二十五國，另三國以觀察員身分列席。不結盟的三個基本原則是：(1)獨立

註④ Leonhard, *op. cit.*, pp. 237-239.

於兩大超強之外，不參與任何軍事或經濟結盟。(2)希望參與不結盟的國家都能以社會主義為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3)希望所有國家都能從兩強的意識形態、經濟、軍事的敵對中解放出來，獲得真正自由^{④9}。

參加不結盟運動的，以阿拉伯國家和非洲新興國家為主，但親西方的菲律賓，親蘇聯的古巴，和走中立路線的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也參加。對於此一非組織的組織，起初是西方歡迎，蘇聯討厭。在狄托死前，不結盟國家計召開大會六次，即貝爾格萊德（一九六一）、開羅（一九六四）、盧沙卡（Lusaka）（一九七〇）、阿爾及爾（一九七三）、可倫坡（一九七六）及哈瓦那（一九七九）。哈瓦那之會，卡斯楚以蘇共代理人姿態，企圖領導此會，狄托垂垂老矣，已預見此一組織無法保持「純潔」，前途未可樂觀。越南、高棉都是不結盟會員國，阿富汗且為發起國。蘇聯指使越南入侵高棉，並直接派兵入侵阿富汗。狄托於一九八〇年五月死亡，參加不結盟者已有九十六國。不結盟大會如再召開，可能變成西方討厭，蘇聯歡迎的態勢^{⑤0}。

史大林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將狄托驅逐出東歐集團之外，七年後的一九五五年六月，赫魯曉夫移樽就教，允許有「不同道路通向社會主義」的自由，兩國關係稍有改善。一九七一年九月布里茲涅夫訪問南國，懇求狄托再返回蘇共陣營，因為那樣「對我們整個馬列主義者，都會有極大好處。」接着蘇聯以十三億美元貸款，援助南國。狄托亦曾於七十年代兩度訪俄。以上一切努力，對於改善蘇南關係，並無顯著幫助^{⑤1}。主要原因還在國家獨立主權和不結盟態度的意識形態之爭。狄托死後，不結盟會議是否應繼續召開，亦成爲爭執的重要原因之一^{⑤2}。

在對南斯拉夫態度上，除赫魯曉夫時代外，中共始終和蘇聯差距不遠。史大林時代中共跟着史大林反狄托，赫魯曉夫高唱「三和」政策，主張與南修好，所以中共否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指南國是「美帝帶頭軍」^{⑤3}。隨着布里茲涅夫對南國的好政策，中共也於一九七〇、七一年和南國互派大使，八〇年代初並大力學習「南斯拉夫經驗」。中共和蘇聯，都在向南斯拉夫大獻殷勤，爭取好感。

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展望

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八一年二月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會上，很自豪的說：「不結盟運動曾經是、仍將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因

註^{④9} Slobodan Stankovic, *The End of the Tito Era: Yugoslavia's Dilemma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81) Pp. 91-92.

註^{⑤0} *Ibid.*, Pp. 92-94.

註^{⑤1} *Ibid.*, Pp. 78-81.

註^{⑤2} *Ibid.*, P. 98.

註^{⑤3} 前揭〔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頁一九八。

素，今年這個運動恰巧已存在二十年。它的力量，在於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反對戰爭與侵略方向。」古巴插入，狄托死亡，不結盟運動已成蘇聯領導第三世界的工具。另一方面，布某對蘇聯與安哥拉、衣索匹亞、莫桑鼻給、阿富汗、南葉門等「人民民主共和國」簽訂友好條約，表示滿意^⑤。但避免談到蘇俄支持越南部隊，侵入高棉，威脅泰國的問題。

越南步兵十師，裝甲兵一師，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佔領金邊，推翻高棉波布 (Pol Pot) 政權。當時有蘇聯四千顧問在越南南方工作，有三十名蘇聯軍官在高棉磅湛助越軍第十師作戰^⑥。

美國主管安全事務的國務次卿巴克萊 (Jane Buckley) 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在馬尼拉說，蘇聯已把美國在一九七五年撤退越南前所建設的第一流海軍基地金蘭灣 (Cam Ranh Bay)，變成軍事進攻的前進基地，用它控制整個南中國海^⑦。

因而，蘇聯是在爭取世界戰略優勢，企圖締造西南非、西部亞洲、南部亞洲弧形戰略帶，從北方及南方包圍歐洲，孤立美國。這條弧形戰略帶，現在大致已經完成。這一點中共的恐懼和自由世界的看法，大致相同^⑧。

爲了對抗蘇聯威脅，中共竭盡全力拉緊美國，並在亞洲找朋友。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爲中共和北韓簽訂「友好互助合作條約」二十週年，中共致電北韓金日成：「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朝鮮人民要求美軍撤出南朝鮮、反對製造『兩個朝鮮』的正義鬭爭，堅決支持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關於自主和平統一的原則立場和合理主張。」金日成致電中共：「我衷心祝願你們和兄弟的中國人民，在使臺灣回歸祖國、統一全中國的偉大事業中，取得新的成就」^⑨。兩者對侵略大韓民國、中華民國，互相聲援支應。

大韓民國和中華民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面臨的敵人是相同的，遭遇的威脅和困難也相同。兩國在對抗國際共產擴張的戰略地位，特別重要，兩國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奮鬥，對於阻止共產侵略，保障世界和平，貢獻尤其偉大。

另外中共「總理」趙紫陽於一九八一年六月，訪問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等國，接着派「外交部長」黃華，於六月底七月初，分訪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趙紫陽並於八月訪問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泰國等「東協」國家。他學周恩來當年僕僕風塵去找朋友，但成績極差。每一國家都對中共的支援當地土共，製造陰謀顛覆，深具戒心。

註^⑤ 前揭「布里茲涅夫在第二十六次大會報告」，第一部份。

註^⑥ 「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法新社」消息。

註^⑦ "China Post"，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

註^⑧ Jonathan D. Pollack, "Chinese Global Strategy and Soviet Power." See "Problem of Communism, Vol. XXX No. 1 (Jan. -Feb., 1981) P. 62.

註^⑨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一日。

在國際共產分裂聲中，中蘇共的合作，目前沒有可能。但兩者併吞世界的目的相同，只是方法各殊。現在中立主義或不結盟運動，都已失去號召力量，尚具有吸引力的新形象是歐共主義。這因為歐共主義標榜的獨立自主、自由民主思想，最合於現代政治潮流，所以中蘇共雙方都在極力爭取。

意共、西共、法共被認為是歐洲最主要的歐共主義者，其他瑞（典）共、英共、希共、日共、澳共，都被認為屬於歐共主義。「歐共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沿着國家共產主義，朝向獨立民主的運動，而且是一個向多元民主社會主義目標前進的運動。因而它必須被視為一種國際性運動」^⑤。

意共總書記陶格里亞第（Palmiro Togliatti 1893-1964），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建立意大利共產黨。他曾參加第三國際第五次（一九二四）、第七次（一九三五）世界代表大會，並為一九四三年國際解散宣言上簽字人之一。由於領導國人反抗法西斯政權，戰後意共儼然成為大黨，一九五三年大選，獲總票百分之二十七以上。他主張由民主道路並依各國條件特性，自行實現社會主義。一九六四年死前遺囑，尤其把各國共黨應獨立自主，由大眾參與，共同建立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予以澈底發揮。繼任總書記朗果（Luigi Longo），走的仍是前任路線^⑥。

次於意共的西歐大黨是法共，法共的强大，同樣得力於戰時領導國人，抵抗侵略。法共歷來同情南國獨立路線及「捷克之春」運動，主張放棄蘇聯僵化組織及官僚統治。法共態度一直親蘇，但總書記馬柴（George Marchais）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掌權前，即一直主張，法國的政策應該在巴黎決定，不在莫斯科或華盛頓^⑦。一九七七年以來，他堅持法共與自由不可分，不論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自由都必須受到充分保障。他說工人要保護國家財產，保衛國家的獨立自由。國家有絕對自由獨立去決定如何實現社會主義^⑧。

西共在所有歐共國家中，對歐共主義的觀念，分析最為清晰。卡利洛（Santiago Carrillo）自一九六〇年當選總書記，蘇南決裂時，卡氏就曾斥責國際的決定是「不可原諒的錯誤」（Unforgivable error）^⑨。一九七七年他出版「歐共主義與國家」（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一書，說歐共主義可溯源自二次大戰時的羣衆路線。它的發展就是社會主義團結與民

註⑤ Wolfgang Leonhard,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tr. by Mark Vecchi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pp. 15-17.

註⑥ *Ibid.*, pp. 165-173.

註⑦ *Ibid.*, pp. 187-191, 194.

註⑧ *Ibid.*, pp. 209-212.

註⑨ *Ibid.*, pp. 214-216.

主的戰略方向。他強調長期奮鬥的經驗證明，民主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⑤4}。他認為必須建立純真的、健康的國際，放棄馬克思暴力革命、階級鬭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思想，放棄歷史唯物主義，尊重人權，增進自由，實行議會多數的民主政治，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必將為人類展開^{⑤5}。

布里茲涅夫對於歐共主義，極力順着西歐口吻，加以讚揚。他說：「正如我已經說過，社會主義基礎的建立與鞏固，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在各個不同的國家中都有其各自的特性。因此，談論什麼『統一化』，都是忽略了實際的事實」^{⑤6}。中共這兩年對於意共、西共、法共等主張的歐共主義和議會民主路線，也讚不絕口。

基於以上分析，展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過程，可獲以下結論：

第一，中蘇共和解目前沒有可能，中立主義和不結盟運動等以第三世界為基礎的號召，難再產生力量。真正能獨立於中蘇共以外，成為共產世界第三勢力的，當屬歐共主義新興勢力。

第二，歐共主義是在當代國家要獨立，政治要民主，民生要富足的時代要求下，希望從自由與共產夾縫間，尋求生路。其精神可上溯自第二國際和第一次大戰時的奧馬學派，不是任何人所創新。通過議會民主政治，歐共主義所可能實現的，是修正後的正統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但不可能是西方的民主政治。

第三，「有限主權論」是共產帝國主義給附庸國家設定的最後防線，為任何獨立自由國家所難容忍。資本主義興盛之後，產生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鬭爭，勝利者恒屬於民族主義。普法戰爭打敗第一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敗第二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敗第三國際，可作明證。「有限主權論」所以必然失敗，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永遠局限住民族主義。

第四，共產主義本身是一條死路，理論早已破產，不在本文論述範圍。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面臨共同敵人，同處於世界戰略最重要地位。友好合作，團結反共，是走向共同勝利的最佳道路，對中蘇共或歐共主義存任何解決世界和平問題的幻想，都會對國家帶來災害。

註^{⑤4} Santiago Carrillo,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p. 128-130.

註^{⑤5} *Ibid.*, pp. 132-133.

註^{⑤6} 前揭「布里茲涅夫對蘇共第二十六次大會報告」，第一部份。